
融入经济全球化之路：中国“入世”15年的回顾与展望

王新奎

摘要：中国“入世”以后，全球价值链处于大规模展开和深化的过程。WTO 多边体制面临重大挑战，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正在重构，区域性的超级区域贸易协定正在产生，反映了占据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层级高端位置的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在这15年中，中国也正式开启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征程，实施以加快知识资本投入为主要手段的全球价值链提升战略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将来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基调。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贸易投资规则；中国“入世”；战略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 (2016) 06-0005-07

一、中国“入世”的经济全球化背景：全球价值链的展开与深化

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展开和深化。所谓全球价值链是指建立在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布局基础上的、覆盖包括制造和服务在内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以分层式生产和中间品任务贸易（task trade）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范围内的东西方冷战逐步结束以来，在信息与通讯技术取得革命性的进步、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以及一批新兴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国际分工形式从19世纪后期以来的消费与生产的“一次拆分”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生产本身的“二次拆分”，^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迅速展开和深化。目前，按价值链增加值层级位置分工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已经形成。

如图1所示，如果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层面来观察，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大致可分为5个增加值层级，以类似微笑曲线的方式展开。处于价值链最高端的是引领型供应链创新层级。该层级的增加值主要来自于研发、技术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其次是核心零部件应用技术创新层级。该层级的增加值主要来自于制造技术及质量、标准和管理创新。该层级的增加值主要来自提供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投入要素。第三是追随性技术/服务创新层级。该层

作者简介：王新奎，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

① 参见：全球价值链时代：测算与政策问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A），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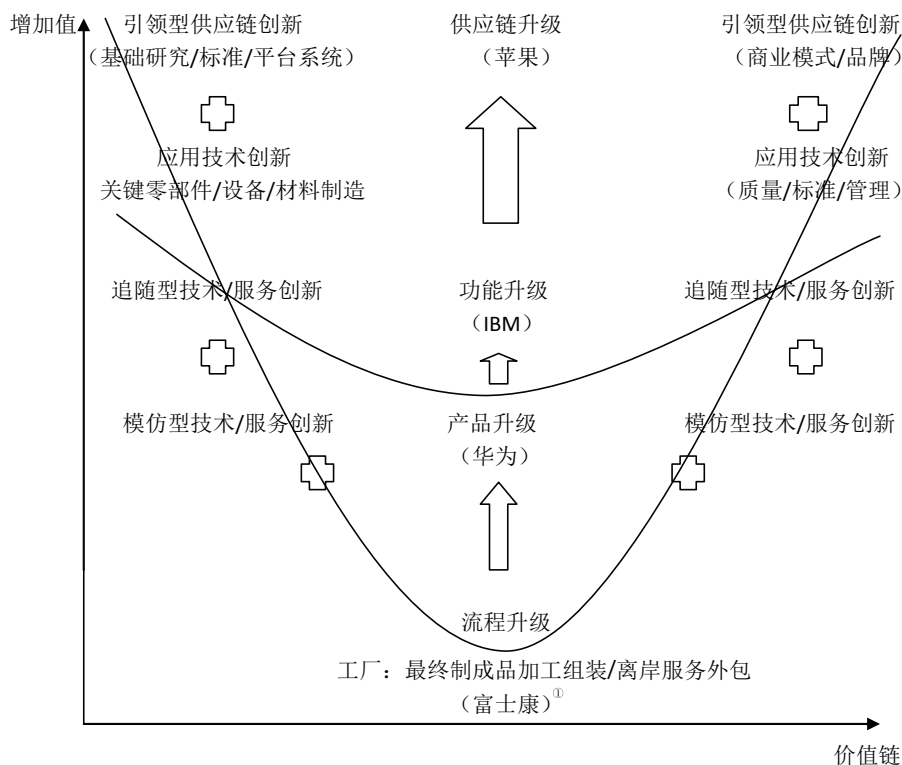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贡献率层级微笑曲线（行业/产品）

级往往是在引领型供应链创新已经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采取追随的策略，在某一关键的价值链环节跟进再创新。该层级的增加值主要来自在价值链某一环节的独占性优势。第四是模仿型技术/服务应用创新层级。该层级往往是对一项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的技术服务或商业模式创新的模仿。该层级的增加值主要来自于规模优势。第五是承担最终制成品的加工组装或服务的离岸外包的工厂层级，主要功能是把供应链创新、追随或模仿型技术服务创新成果转化为能投放市场的具体的制造或服务产品。该层级的增加值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成本优势。

目前，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在引领型供应链创新、应用技术创新和追随型技术/服务创新价值链层级占据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在最终制成品加工组装/离岸服务外包价值链层级占据主导地位，并正在向模仿型技术/服务创新价值链层级提升。

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布局一般取决于供应链网络所在国家之间的以下3个基本因素：一是运输成本，二是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的均衡性，三是整体要素

① 供应链升级：公司特有的管理技能（从创业的试错过程中获得的），灵活的组织结构；功能升级：复杂的技术和设计，基本认可的品牌，营销能力、零售和合作网络；产品升级：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技能、良好的设计、关于消费偏好的“大数据”；流程升级：丰富的流程管理专业知识、高效的采购网络、软件和其他CT复杂加工任务。参见：互联经济体 .OECD，表 7.2。

禀赋结构与供应链各价值环节增加值特征的一致性。上述影响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布局的 3 个基本要素，决定了众多全球性跨国公司一般会在某一特定区域进行供应链的集中布局，在某一区域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布局结构。

如图 2 所示，当前全球价值链活动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与东亚地区，每个地区都已经形成内部的区域价值链，各区域之间又形成密切的洲际价值链关系。其中，北美以美国为核心，该区域总体具有引领型供应链创新的特征；欧洲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核心，该区域总体具有追随型技术 / 服务创新的特征；东亚区域以日本为核心，该区域总体具有应用技术创新和模仿型技术 / 服务价值链创新的双重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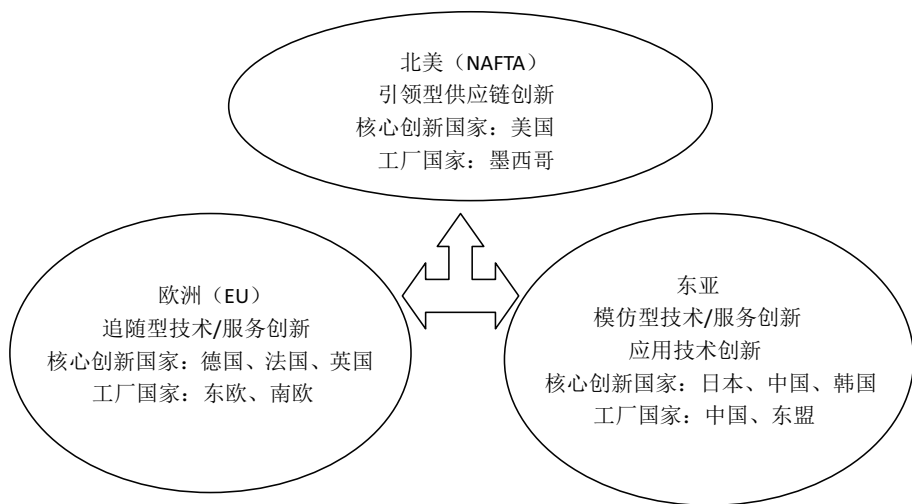


图 2 全球价值链展开的行业与区域特征

全球价值链的展开和深化是促成过去 30 年全球贸易和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中国正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发展趋势的机遇，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有远见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迅速崛起为全球最主要的贸易大国和经济体之一。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入世”15 年之际，全球价值链这一阶段的大规模展开和深化过程已告一段落。与 15 年以前相比，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全新发展环境。

二、WTO 多边体制面临的挑战：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通信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出现了智能制造与数字服务相融合的基于物联网的创新平台，其最大特点是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把制造和服务、运输和销售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动态、细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具体表现为：

首先，依托物联网的小批量、分布式、非标准的制造组织方式，逐步相对于大批量、集中式、标准化的制造组织方式取得竞争优势，因此，由大量生产者参与的

小批量、分布式、非标准的制造和服务企业把投资和产业布局向紧贴消费市场的所谓的“近岸”转移，最终形成新的全球生产布局。国际贸易的方式开始从传统的国家对国家的贸易方式转变为供应商对消费者的点对点的直接跨境贸易方式。

其次，通过服务贸易的数字化，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加速融合。据全球价值贸易数据库统计，当前全球价值链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服务贸易。尽管服务贸易出口份额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0%，但在全球出口的输入增值中，服务贸易部门贡献了几乎一半（46%），原因是制造业的产品出口需要大量的服务。当前，绝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正日益朝着提供服务输入的方向发展。正如数据所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存量中超过60%是服务贸易投资（制造业与第一产业的投资仅占26%和7%）。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相似。^①

最后，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产业部门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制造和服务融合的新型产业。贸易的增加值来源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本转向技术和知识。约束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已从传统的实物资源转向非物质的信息资源。

进入21世纪以来，服务数字化趋势给全球价值链带来的迅猛变化必然要求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的要求使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体系进入了自GATT-WTO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最重要的重构过程。迄今这一重构过程还刚刚开始，但已经呈现出以下趋势：

首先，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平台从WTO多边贸易体系转向区域性的超级区域贸易协定（FTA）。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连接北美区域和东亚区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和连接北美区域与欧洲区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这一趋势完全与本文前述的全球价值链展开的区域特征相一致，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以全球价值链展开和深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重心从传统货物贸易领域转向服务贸易领域，从贸易领域转向投资领域。规则的内容出现了所谓的21世纪高标准，包括投资的国民待遇要求从传统的市场准入阶段延伸到准入前和准入后企业的生命周期全过程；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要求从传统的边境措施延伸到边境后措施；规则约束的范围从贸易和投资领域扩展到环境、劳工、反腐败等社会领域等等。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空间也开始从实体生产和贸易的领域拓展到虚拟生产和数字贸易的领域。对与商业数据跨境流动有关的海关关税、非歧视性待遇、个人信息保护、计算机设施的位置和非应邀电子商业信息等确定了相应的规则制定原则，与数字产品跨境交付有关的新的服务贸易规则的雏形已经形成。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这一趋势

^① 全球价值链与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增值贸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2。

基本反映了已经占据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层级高端位置的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

三、中国“入世”15年：开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征程

在当前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为基本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格局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在过去30年间形成的建立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基础上的国际竞争力，客观地判断中国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变化趋势。

表1为1995~2011年间，中国和美国按海关总量或贸易增加值统计计算的货物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以符号RGC1、RGC2/RGA1、RGA2表示）、按贸易增加值统计计算的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与按海关总量统计计算的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之差（分别以符号RSCD/RSAD表示）、以及中美两国RSCD与RSAD之差的绝对值（以符号RGDD表示）。

本文之所以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同口径统计数据来观察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层级位置变化趋势，所依据的理由有3个：一是中美两国是目前世界上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最深的贸易大国；二是两国的进出口结构均具有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特征；三是中美两国之间相互贸易依存度极高，且处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两端。故通过观察中美两国在全球贸易中位置的相对变化，能较好把握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趋势。

迄今为止，除了行业层面的螺丝刀经济学研究以外，尚未有能够精确测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贡献率层级位置的方法。本文用比较按海关总量统计计算的一国货物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所占比重与按贸易增加值统计计算的一国货物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方法，间接、近似地判断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层级位置的变化情况。采用该方法的依据是：从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来说，全球按海关总量统计计算的货物出口总价值应等于按价值贸易统计计算的货物出口总价值。因此，按国别来统计，如果一国按贸易增加值统计计算的货物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高于按海关统计计算的同一比重，则说明该国的货物出口中包含了较多的本国增加值，同时也说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较高的层级位置。反之，如果一国按贸易增加值统计计算的货物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按海关统计计算的同一比重，则说明该国的货物出口中包含了较多的进口增加值，同时也说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较低的层级位置。

首先观察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层级位置的变化趋势。在1995~2011年的整个观察期内，中国货物出口的RGCD值始终为负值，而美国的RGAD值始终为正值。这说明，在这段时期内，尽管从总量变化的角度来观察，中美两国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如果从全球价值链层级位置的角度来观察，中美两国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层级微笑曲线的下半部。如果进一步观察RG数据可以发现，在1995~2011年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层级位置总体上呈下降趋势，RGCD值从1995年的-0.81下降到2011

表1 按海关总量和贸易增加值统计计算的中国/美国货物
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1995~2011年）（单位：%）

年份	中国			美国			RGAD -RGCD RGDD
	按海关总量 统计 RGC1	按贸易增加 值统计 RGC2	RGC2- RGC1 RGCD	按海关总量 统计 RGA1	按贸易增加 值统计 RGA2	RGA2- RGA1 RGAD	
1995	2.59	1.78	-0.81	12.57	13.61	1.04	1.85
2000	4.04	2.77	-1.27	13.06	14.62	1.56	2.83
2005	7.93	5.77	-2.16	9.36	10.56	1.20	3.36
2008	9.84	8.38	-1.46	8.79	9.69	0.90	2.36
2009	10.78	9.03	-1.75	9.26	10.57	1.31	3.06
2010	11.53	9.65	-1.88	9.08	10.36	1.28	3.16
2011	11.66	9.88	-1.78	8.81	9.81	1.00	2.78
1995~2000	0.29	0.24	-0.09	0.10	0.20	0.10	0.20
2000~2008	0.73	0.70	-0.02	-0.53	-0.62	-0.08	-0.06
2008~2011	0.29	0.28	-0.11	0.007	0.04	0.03	0.14

数据来源：以上所有数据根据 OECD-WTO 增加值贸易数据库整理；其中：货物总贸易数据来自各国海关统计，服务总贸易数据来自各国收支平衡表统计（BOP）。

数据说明：货物部门包括：农林牧渔、采掘业及制造业；服务部门包括：商务服务、建筑服务、水电等公用事业及社会服务等。

1995~2005 年数据为每 5 年统计，2008~2011 年数据为每年统计。

1995~2008/2008~2011：为 1995~2008 年及 2008~2011 年间，用百分点计算的，中美按海关总量统计计算的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年平均变化率（RGC1/RGA1）、按贸易增加值统计计算的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年平均变化率（RGC2/RGA2）、按海关总量统计计算的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与按贸易增加值统计计算的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差距（RGCD/RGAD）的年均变化率以及中美 RGCD 值与 RGAD 值之差（RGDD）。

年的 -1.78。其中，1995~2000 年间，RGCD 值年均下降 0.09。2000~2008 年加入 WTO 前后，RGCD 值年均下降幅度缩小到 0.02，但 2011 年以后 RGCD 值又扩大到年均 0.11，甚至高于 1995~2000 年的水平。反观美国，1995~2000 年间，RGAD 值年均上升 0.10。但到 2000~2008 年间，RGCD 值迅速变为年均下降 0.08，但 2011 年以后 RGCD 值又由负转正，年均均为 0.03。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反映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层级相对位置变化的 RGDD 值，1995~2000 年间，年均扩大 0.20。2000~2008 年间，曾逆转为年均缩小 0.06，但 2011 年以后，又开始变为年均扩大 0.14。

上述统计现象反映了 1995~2011 年间，特别是 2000~2008 年加入 WTO 前后，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加工组装型产业转移，出口贸易以低增加值率的加工贸易为主，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处于图 1 微笑曲线的底部，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通过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以后又重新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事实。^①美国在全球

① 由于缺乏 2011 年以后的统计数据，故无法对最近 5 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变化情况做出判断，但据中国科学院全球价值链课题组的最新研究，2015 年，按相应的出口商品结构测算，无论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中国的平均直接增加值率和平均完全增加值率与 2014 年相比均略有下降。

价值链位置的这一重新提升趋势反映了一种建立在网络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服务业和制造业逐步融合基础上的新的全球价值链竞争新模式正在形成。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当前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从以提高各自按海关总量统计的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为主要目标的竞争,转向以提升各自按价值贸易统计的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为主要目标的竞争。在这一轮竞争中,知识资本已经成为很多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对知识资本的投资一直在增长。美国和英国对知识资本的投资已超过对实体资本的投资。^①

全球价值链创造的价值不是平均分布的,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主要依赖于参与者提供难以模仿的知识资本的能力。一国的知识资本投入越多、既有的存量越大,其进入全球价值链上价值位置更高的细分市场、实施价值链升级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背景来思考中国“入世”15年以后所面对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就可以发现下列带有根本性的政策含义理解的转变:

如果认识到像数据、品牌、基础研发、设计以及软件与组织结构的复杂整合等方面的隐形知识是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知识资产,我们就会发现,知识资产预示了更为广泛的创新概念。通常仅仅关注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来制定创新政策显得过于狭窄,需要对一些长期存在的创新计划进行重新设计。

知识资本与创新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征决定了能否有良好的把资源成功地引向最有效率的公司和国家的制度环境变得至关重要,包括一国国内的制度环境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制度环境,其中主要包括政府的监管一致性、金融效率与自由、教育的质量与普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等方面。

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是一国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必要条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公司无论是实施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还是供应链升级,都必须在其所处的全球供应链上才能完成。公司唯有在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下,方能全面利用全球供应链,并把自己的知识资本成功地引向最有效率的公司和国家,从而实现价值链的升级。

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具有显著“赶超经济”特征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如果仅仅从开放的角度来考察,究其成功的经验,无非有3条:一是在开放道路的选择上,全面接受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二是在开放的模式选择上,坚决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力吸引外资;三是在开放路径的选择上,瞄准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贡献率层级的低端,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把按海关总量统计计算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做到极致。

^①全球价值链与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增值贸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2.

China's Fifteen Years of WTO Membership: The Change of China's Role i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TU Xin-quan

Abstract: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n 2001, China's position in world trade and economy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has greatly evolve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has achieved a lot while facing serious and fundamental challenge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particularly the megaregionals have become the major approach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to promote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which however is also facing counteraction of glob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economic recession, and the anti-globalization sentiment. China has benefited a lot from WTO membership but not taken an active strategy in the involvement of WTO.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China should use the WTO as the prime platform and push forward the conclusion of Doha Roun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be open to various approaches to promote discussions and negotiations on new issues and take a targeted RTA strategy as to different partners to enhance China's position i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a; WTO;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金孝柏)

(上接第11页)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发展趋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开放战略的选择上，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被边缘化已经成为事实，新兴的区域超级FTA安排又因反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而障碍重重，故中国已经不可能取得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一样的对外开放制度红利。在开放模式的选择上，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已经不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样依靠特殊政策来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在开放路径的选择上，长期以来依托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消失，瞄准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贡献率层级的低端，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把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做到极致的路已经越走越窄。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施以加快知识资本投入为主要手段的全球价值链提升战略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基调。

Integration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t the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ANG Xin-kui

Abstract: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e mechanism is faced up with significant challenge. Global rules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re under reconstruction, featuring the negotiations and conclusion of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hich reflects the interest claims of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at the top of global value chain level.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China has started its new journey of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t is inevitable for China to take input of knowledge capital as a main strategy for upgrading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in its future wider opening policy.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trade and investment rules;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strategy

(责任编辑：金孝柏)